

大流行病影响下的巴西社会关系重组

周燕 Reginaldo Junior

众所周知，新型冠状病毒在巴西的传播缺乏有效控制。截至8月下旬，巴西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2000万例，稳居全球前三位。除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和村庄能够及时识别并隔离新冠肺炎病例之外，大部分地区的疫情发展已处于失控状态。尽管“第三波”疫情来袭，但圣保罗州、巴西利亚联邦区、里约热内卢州等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决定进一步放开对商业活动、文化活动、学校和其他公共空间的防疫限制。以圣保罗州为例，该州于8月中旬取消了对所有商业活动营业时间和接待人数的限制，文化活动也获准开放。¹

生命健康和经济复苏在疫情面前似乎成了两难的对立。在政府公共能力无法应对疫情扩散的情况下，一部分对家庭成员和当地社区有责任感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巴西人，自去年3月新冠病毒在社区开始传播以来，就一直在个人主动性可及的范围内自我保持社交距离；也有很大数量的巴西人并不遵守有关社交距离的规定。巴西社会正在因为人们对待保持社交距离的不同态度而产生分化，社会生活的边界也正在改变，社会关系因此逐步重组，并有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一、社交距离的多元化实践

自新冠疫情在巴西流行之初，隔离措施和社交距离就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在多党联邦制下，巴西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政策协调上难以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抗疫措施存在显著的分歧，不同的地方政府在不同时间段对保持社交距离都有着差异化的要求。面对政府的消极抗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和策略来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个人健康有较大顾虑的人们只能自主维持社交距离。

一项今年上半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79%的巴西人认为新冠疫情在巴西已经失控，82%的人担心自己可能会感染病毒。²从新冠病毒在巴西社区广泛传播开始，生活在巴西大都市里的人们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每次离开家都会暴露在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可能性最高的环境里。这种不安全感与恐惧感与现任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为首的联邦政府对待新冠疫情的不作为态度有关，也与人们身边真切的感染和死亡病例相关。尽管各地感染率不尽相同，各州州长和市长也自主地采取了临时措施来减少人员流动，如禁止大型活动及关闭学校、办公室和商店等，但是感染新冠病毒并将其带回家的切实可能性并没有离开每个人的视野。

有效的隔离措施以及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控制病毒的传播，为人们的生命健康提供一定保障。然而，巴西联邦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社交距离的相关规定，却无法在执行层面严格实践。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自主遵循社交距离的原则来应对感染病毒的风险。出于不同的原因，巴西人对社交距离的态度及其实践存在较大的差异，其背后体现的是疫情影响下的社会分化。

巴西官方对于践行社交距离的定义是：有助于减少人们在公共集体空间（街道和广场）和非开放空间（商场、音乐厅等）集会和流动的各类措施；具体包括停止非必要的服务（如关闭除超市和药店等基本服务以外的其他商店），取消或推迟节日庆祝和其他活动，暂停面对面的教学活动，推行远程工作方式等。³

在实际操作层面，最明显的分化是遵循与不遵循社交距离的群体之间的区别。遵循保持社交距离原则的群体首先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其次有条件维持社交距离，例如有足够的防疫物资、出行依靠私家汽车、工作性质允许在家办公、有家人和朋

友的情绪支持等。不遵循社交距离的群体则分为主动不遵循和被动不遵循两类：前者与博索纳罗一样，弱化新冠病毒的威胁，将个人自由和短期经济利益置于集体福祉之上，多为在政治立场上较为保守的群体；⁴ 后者大多是因为客观条件受限而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例如必须依靠公共交通出行、为了生计必须去有感染风险的场所工作等（街头非正式经济、餐厅等服务行业）。

此外，更微妙的差异存在于人们在休闲时间内对待社交距离的态度。在工作场所，许多公司和机构在工作性质允许员工采用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多次演练了返回办公室恢复面对面办公的方法，但在流行病学指标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他们又退缩了。许多雇主还自行进行了计算和预测，并提醒他们的员工可能会一直采取家庭办公的方式。而对于数百万恢复了面对面线下办公的员工以及其他数百万从未执行社交距离政策的员工来说，限制社交距离的负面影响转移到了休闲时间。虽然公共交通的通勤、主干道上的交通堵塞、整个营业时间段内的工作仍是生活中的日常，但人们与朋友们的聚会、集体体育活动、宗教仪式、政治会议等，已经从常规中消失了。

随着巴西政府对于商业和文化活动限制的逐步放开，许多人开始光顾餐厅和酒吧等场所、开展集体文体活动、参加宗教集会等，但依然有很大比例的巴西人选择按照自己对风险的评估来遵循个人的社交距离准则。

二、受限的社会关系网络

可以看到，在整个疫情流行期间，不同层级的巴西政府在制定限制性措施时，界定了哪些是被认为必要的服务。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归类为必要的服务是唯一允许保持开放的。在重新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对于哪些部门应该优先恢复其活动存在多方面的考虑，例如对创造就业机会的影响、新冠病毒在环境中传播的可能性等，但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些部门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方面。公民面对政府当局的行动不一致以及对传播的信息不信任时，会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考虑什么样的服务和活动对他们自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并在日常决定中评估是否当天必须出门办事或与其他人见面。

许多巴西人为了生计必须离开家去外面工作，但在工作之外的个人时间里，他们会在对风险评估和事情重要性的多重考虑的基础上管理时间安排和空间移动。例如，如果今天需要去看医生，许多人会根据自己此刻的症状缓急来判断是否可以推迟，甚至是否有自愈的可能；人们会根据家庭用品和食物的存量，仔细计算应该多久去一次超市、菜市场或药店；在面对恋爱关系时，人们会考量每隔多久见一次面才能维系亲密关系；面对不同的朋友和家人时，人们也会考虑应该优先与哪些人见面，以及如何管理会面的频率；此外，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在维持了几个月严格的社交距离后，人们会考虑是否需要出门旅行一趟以及期间需要做什么样的防护准备。

在重重的考虑与评估之下，人们共享日常生活、分享共同经历、集体创造新故事可能性的连接纽带受到了限制。许多原本日常轻松的事情都变得艰难，如与社区和城市的直接接触、与陌生人的互动、维系与不那么亲密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友谊等。当许多国家关闭边界以防止新冠病毒及其新变种的传播时，许多人也对其他人关闭了自己的边界，而且不仅限于物理边界。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社会关系网络的受限在巴西社会里引发的矛盾和张力更为突出。一项关于“关系流动性” (relational mobility) 的研究分析了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将巴西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归类为高关系流动性社会，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低关系流动性的东亚社会。在巴西这样关系流动性高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更加开放、热情且善于交际，社会关系更加流动和亲密，如拥抱、握手和亲吻等身体互动对于形成和加强关系至关重要；人们倾向于做出更多努力来加强被认为更重要的关系，以减少孤独感，同时他们也更容易解除不好的关系。⁵ 然而，新冠病毒的传播显著限制了巴西人与家人、朋友、同事、邻里、熟人及陌生人之间的高频率互动行为。与低关系流动性社会里的人们相比，巴西人面对孤立和“被困”的状况普遍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居住空间内的家人和已建立亲密稳定关系的朋友们成为了人们日常互动的主要对象，社会关系网络也因此更加原子化。

一种新的矛盾似乎已经显现出来。解决此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方法越来越体现为全球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合作，但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则沉浸在他们自己范围内的事件、问题和解决方案中。与此类似的是，巴西地方政府层面上减少病毒传播的行动要求集体性的努力，控制人员的流通并采取预防措施，然而个人的应对策略则使行为主体沉浸在自己必须保

持的直接联系和生活必要活动所建立的个体化边界内。

三、社交距离影响下的社会资本

依托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交距离影响下受限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矛盾和局限性。然而，虚拟互动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也很难有助于增加促进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

手机和互联网帮助人类完成了在整个历史范围内最富想象力的伟大梦想之一，超越地理位置的限制而实现了与其他人的即时交流。但正是在这个时代，关于面对面互动和虚拟互动之间差异的研究却越来越丰富。人们在享受虚拟互动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越来越关注面对面互动所无法被取代的优势，尤其是其对心理影响和社会关系的作用。

与面对面互动相比，虚拟互动无法产生好的生活故事。巴西有句俗语说得好：“你喝啤酒是因为你不能通过喝牛奶来交朋友。”同样地，好的新故事和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只有在有利于交流、分享和互动的空间才有可能产生。在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人们生活中的新故事并没有减少，只是远不及之前那么有趣。生活中的故事每天都在产生，但被限制在人们开始建立的不同维度的边界内。人们在虚拟互动中交流的内容相对平面化，可以互相询问最近发生的事情、新的工作或学习变化、可能存在的困扰等，但无法在同一空间内分享细节。随着日常联系数量的限制以及物理和虚拟空间的隔离，总的来说，生活中的故事变得碎片化和重复化。这样的变化对社会资本也产生了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 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和集体性特质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诸如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可以促进以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协调与合作；以街区、城镇、州省或国家为单位的社区团体内的社会资本是由这些结构内居民互惠性的规范所产生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影响该社区团体在许多领域的共同利益，如公民参与、教育等；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合型 (bonding) 和桥接型 (bridging)，前者指的是同质性的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持；后者指的是与更异质性团体的成员之间的联系，能够提供来自外部的资源和区别于本社会网络的信息。⁶ 在结构性或集体性的视角下，社会资本可被视为是一种公共产品，而关系互动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关键步骤。

巴西的不同阶层群体在居住空间方面本身就存在显著的分化与隔离现象，例如，城市中心与边缘地带、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富人区与贫民区等。居住空间的疏远和物理性屏障的构筑导致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象征性壁垒，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各社会阶层形成各自的社会交往规则，减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非正式社会接触和互动。⁷ 在新冠疫情期间，维持社交距离的规则使得巴西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减少，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由此更加严重。即便是在同一个社区内，人们对新冠病毒应对策略的不同也导致彼此之间的互动显著减少，除了家庭之外的“附近”正在慢慢消失。

在碎片化和重复化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巴西人树立起了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的边界，社区内同质性的社会资本削弱，不同阶层间异质性的社会资本更是减少，社会信任减退，以共同利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人们更加倾向于坚持既有的立场，或者更容易受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的影响。

结语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使我们被迫进入一个社会关系深刻重组的时期。在很有可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情况下，政府层面的考虑是在多大程度上开放服务和活动，个人层面的考虑则是根据自己对风险的评估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社交距离的原则。

新冠疫情迄今为止在巴西的发展方式及其应对情况，使巴西成为研究人员探索这种大流行病引起的社会转型、影响和趋势的一个特殊场所。随着更多的事实、行动、联系和情感转移到虚拟世界，我们生活中重要的、越来越多的部分渐渐地已经进入了虚拟的领域。这种结构调整的有些趋势是相当明显的，另一些则依然非常模糊，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社会提出的是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如何在新的互动方式下不断拓展社会关系的边界并培育促进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周燕,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国家为巴西。

Reginaldo Junior, 巴西圣保罗市教育局公务员, 毕业于热图里奥·瓦加斯基金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

- 1 Luiza Vidal, “Fim de Restrições no Comércio Não Significa Que Pandemia Está Controlada”, (17 de agosto), <https://www.uol.com.br/vivabem/noticias/redacao/2021/08/17/maior-flexibilizacao-no-comercio-nao-significa-que-pandemia-esta-controlada.htm>, August 23, 2021.
- 2 “Datafolha: 79% dos brasileiros acham que pandemia está fora de controle e 82% temem ser contaminados”, (18 de março, 2021), <https://g1.globo.com/bemestar/coronavirus/noticia/2021/03/18/79percent-dos-brasileiros-acham-que-pandemia-esta-fora-de-controle-e-82percent-temem-ser-contaminados.ghtml>, September 5, 2021.
- 3 Entenda a Importância do Distanciamento Social, <https://coronavirus.saude.mg.gov.br/blog/108-distanciamento-social>, August 23, 2021.
- 4 Guilherme Ramos, Yan Vieites, Jorge Jacob and Eduardo B. Andrade,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Support for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idence from Brazil”, *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Vol.54, No.4, 2020, pp.697-713.
- 5 Robert Thomson, Masaki Yuki, Thomas Talhelm, Joanna Schug, Mie Kito, Arin H. Ayanian, Julia C. Becker et al, “Relational Mobility Predicts Social Behaviors in 39 Countries and is Tied to Historical Farming and Threa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5, No.29, 2018, pp.7521-7526.
- 6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00.
- 7 Luiz C. Queiroz Ribeiro, “Segregação Residencial e Segmentação Social: o ‘Efeito Vizinhaça’ na Reprodução da Pobreza nas Metrôpoles Brasileiras”, *Cadernos Metrôpole*, No. 13, 2005, pp.47-70.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高良敏、郑楠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高良敏、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